

大象学术书坊

庞迪我与中国

张
铠 著

大象出版社

庞迪我与中国

——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

张
铠
著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张铠著.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 - 7 - 5347 - 5340 - 4

I. 庞… II. 张… III. ①庞迪我(1571—1618) - 人物
研究②耶稣会 - 基督教史 - 研究 - 中国 - 明代
IV. B979.955.1 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1245 号

责任编辑 王莉娜

责任校对 温 苏

封面设计 王晶晶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制 版 郑州普瑞印刷制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 960 1/16

印 张 27.25

字 数 374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6202901

前言

塞万提斯在《唐吉珂德》第二部中曾谈到,中国的大皇帝是如何希望在北京建立一所“西班牙学院”。而他的这种远见卓识,如今已经成为现实,这所“西班牙学院”即是2006年7月成立的北京塞万提斯学院。

从这个美丽但并不孤立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通过其文化、哲学和文学所表现出来的魅力,已经深深地感染了西班牙的作家们,使他们关注并进而研究中国。历史上,从16世纪中叶直至18世纪以前的大约150年间,西班牙在整个西方的汉学研究中曾起到重要的先驱作用,并使西班牙成为那一时代欧洲主要的汉学研究中心之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西班牙上述研究汉学的传统没能发扬光大,以至于在其后的200年间西班牙的汉学研究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象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先驱者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竟为历史的尘埃所湮没,直至张铠教授写出《庞迪我与中国》一书以后,人们才开始对庞迪我的生平和业绩重新做出评价。在汉语的教学上,也停步不前。我记得,当我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西班牙开始学习中文时,大家认为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很遥远的、甚至是疯狂的事情。在80年代初期,也只有两所官方语言学校在教授中文。

现在终于到了“回到”中国的时代。所谓回到中国,我的意思是,有许多共同的纽带将我们与中国连结在一起,其中包括我们使用着地球上广泛使用的两种语言,而且两国学习对方语言的热潮正浓:

在中国,与西班牙及西班牙语美洲关系的发展,催生了中国对西语人才的需求。近五年中国教授西语的大学从25所增至近50所。

在西班牙,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已经成立了4所孔子学院,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在马德里将会设立中国文化中心。

西班牙21世纪对外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扩大在亚洲这一区域

的影响。为促进中西两国间的了解,这才在北京建立了塞万提斯学院,并于2007年举办了中国西班牙年。

在此,我想感谢中国政府对塞万提斯学院的支持。这一支持与认可在最近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温家宝总理访问了塞万提斯学院在马德里的总部,并发表了重要的演说。

我还想强调一下,我们进入中国是希望成为连接两大洲的文化交流的桥梁,为增进双方的了解而贡献力量,并使两国人民都从中受益。

今年恰逢西班牙内战70周年纪念,我们举办了关于西班牙内战期间国际纵队中国支队英雄事迹的研讨会。我们还将举行关于被保护的艺术的圆桌会议,将讨论普拉多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在战争时期保护艺术品的共同经验。由中国著名戏剧导演改编的《唐吉珂德》也即将演出。

今年也是西班牙著名耶稣会士、东西方文化交流先驱者庞迪我踏上中国内陆的410周年。大象出版社将把《庞迪我与中国》一书再版。对此我非常高兴。希望今后我们能为加强中西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更大的贡献。

易玛·孔萨雷斯·布依

北京塞万提斯学院院长

序

1597年,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怀着使整个中国基督教化的理想踏上了中华大地。其后他在中国度过了21个春秋,仅在北京就生活了17年,成为晚明在北京从事宣教活动时间最长的一位西方传教士。

庞迪我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正是他生活在其中的那个激变时代的写照。

地理大发现开始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使远隔重洋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相继被卷入世界贸易的漩涡之中,就此出现了五大洲物质与商品的大交流。西方殖民者的征服与扩张活动又使东西方文明以空前的规模处于相互碰撞与融会之中,就此出现了各异质文明之间的大交流。这种全球范围内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相互渗透,在东西方两个世界都引起了巨大的社会震动。

在欧洲的历史性巨变中,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对庞迪我的一生有着重要影响。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在西欧和北欧迅速蔓延并对罗马天主教造成了猛烈的冲击。为了遏制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势头,罗马天主教也不得不进行内部的改革,并由此掀起反宗教改革运动。于是在欧洲宗教战争不断,反“异端”斗争更带有空前的残酷性。

西班牙人罗耀拉创建耶稣会就是想为反宗教改革运动注入新的活力。为了使罗马教廷重振往日的光辉和声望,耶稣会开始向东方派出传教士以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对于西班牙传教士来说,建立“世界天主教王国”更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在美洲殖民者凭借军事暴力手段,采用文化同化政策强制印第安人归信基督教的做法已被证明是一种彻底的失败。那么,什么是行之有效的东方传教策略,围绕这一关键问题在耶稣会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就在东方传教运动面临宣教策略大调整的重要时刻,西班牙著

名耶稣会士沙勿略以“教皇特使”的身份来到东方。他通过对印度、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考察和研究,终于总结出一系列有利于东方传教事业获得成功的原则并提出一些具体措施,其核心内容是凡前往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均应首先学习土著居民的语言,进而要了解并适应当地的文化。然后通过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使土著居民认识到基督教文明的优越性,再最终把他们吸引到主的怀抱中来。这种采用和平手段达到使土著居民基督教化的策略,其主旨在于强调传教士要适应当地的文化,因此这种策略后来在天主教史的著述中常被称作“适应”策略。

但在那一时代,在东方创建救世功业的传教士们并非都认同沙勿略倡导的“适应”策略,尤其是西方各殖民国家的教会组织都代表着各自国家的民族利益和殖民扩张的目标。因此,在东方传教运动中民族主义甚嚣尘上,不同国籍的传教士处于严重的对立之中。

庞迪我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中华帝国,而晚明中国社会同样处于深刻的历史巨变之中,这就注定庞迪我未来的在华宣教事业将充满波折与坎坷。

1600年3月,庞迪我潜入中国大陆后,在南京与利玛窦相会。那时利玛窦已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并已初步总结出在中国宣传福音的一些经验。他坚信在中国这样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只要中国皇帝信奉了基督教,那么整个中国归信基督教将是指日可待的。要想使中国皇帝信奉基督教则必须首先取悦于中国皇帝。而呈献西方新奇的“方物”将是取悦中国皇帝的最佳手段。基于这种认识,庞迪我与利玛窦携带着呈献给万历皇帝的西方珍稀“方物”,于1600年5月循大运河北上进京。

1601年1月,历尽千辛万苦和种种磨难,庞迪我和利玛窦终于到达中华帝国的首都北京。他们成功地向万历皇帝呈进了“贡品”并且博得了皇帝的欢心,于是他们不仅享有了“觐见”皇帝的殊荣,并且获准居住在北京,尤其是可出入紫禁城。庞迪我和利玛窦所取得的上述成就,在西方国家引起巨大的反响,并被视作基督教传教运动的一次重大胜利。

庞迪我从南到北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这使他对中国国情有了亲

身体察的机会。出入紫禁城以及与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交往,加深了他对中国统治体制的认识。至此他深信唯有遵循沙勿略倡导的“适应”策略,基督教传教事业才有望在中国取得成功。而一贯以沙勿略训导为圭臬的利玛窦则成为他追随的榜样。从此,庞迪我也像利玛窦一样,着儒服、儒冠,学习汉语,研读中国典籍,遵从中国的礼仪和习俗,并耐心地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做着“合儒”、“补儒”的工作,以期达到“超儒”的目的。就这样,庞迪我以一介“西儒”的姿态开始融入中国社会。其间,庞迪我于1602年从北京写给西班牙托莱多主教路易斯·德·古斯曼神甫一封长信,即《一些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纪实及他们在这一国度看到的特殊情况及该国固有的引人注目的事物》中,对中国的地理方位、山川形势、物产、人口、城乡概况、经济与贸易发展水平、政治体制、外交政策和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习俗及宗教信仰乃至宫廷内幕等方面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介绍,该文献基本上代表了16世纪与17世纪之交欧洲人对中国最全面、最客观的认识。然而庞迪我写这封长信的真正目的则在于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来论证“适应”策略的正确性和合理性。该文献在那一时代对东方传教运动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此该文献在欧洲受到普遍的重视和欢迎。1604年该文献西班牙文本面世,后又被译成法文、德文、拉丁文和英文,并多次再版。

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在京病逝。这对中国传教团是个十分重大的损失。庞迪我借助与他相熟的中国士大夫的帮助,成功地从万历皇帝那里为利玛窦申请到一块墓地,并为利玛窦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西方传教士的眼中,这无异于中国最高统治者赞成了基督教的律法,所以认为“这个成就或许比前三十年漫长而艰难的奋斗所做出的任何事情都更重要”。通过为利玛窦申请墓地一事既增加了庞迪我在京城士大夫中间的知名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由于利玛窦病故而造成的基督教在中国社会影响上的真空状态。

为了使“适应”策略在利玛窦故去后仍能贯彻实施,庞迪我先后用中文写出《七克》和《天主实义续篇》等多种宣教之作。为避免渗透在这些著作中的基督教学说引起中国士大夫的反感,或是引发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庞迪我在这些著作中所使用的宣教

语言总是以人类普遍的思想这种假设为前提,尽量模糊基督教教义和儒家学说之间的界线,甚至着意寻找两者之间的契合点,并使一些中国士大夫读了《七克》等著作之后,竟致把“天学”当做一种近似于儒家学说的道德说教而接受下来。像《七克》,在中国社会中便颇受欢迎并被一再刊刻。庞迪我也因这些著作一时被一些士大夫尊称为“庞子”、“庞公”。

利玛窦生前,中国传教团共有 13 名传教士。其中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各 6 人,仅庞迪我为西班牙人。西、葡两国又长期对立。为了避免中国传教团内部出现民族矛盾,利玛窦遂内定意大利来华耶稣会士龙华民为他的继任人。利玛窦故去后,龙华民则升任中国传教团会长。然而他对“适应”策略却持有异议并对庞迪我进行了公开的批评,由此在中国传教团内部挑起了“礼仪之争”。

龙华民急于创建救世功业,所以他不切实际地打算直接上疏万历皇帝,请求准予在中国自由传教。他的这种空想当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于是他感到在北京的社会条件下很难实现他的理想,于是他开始把他的宣教重心转移到南京会院。这样,在中国出现了两个耶稣会宣教中心,即北京会院和南京会院。

在南京会院,龙华民以地理大发现以后恶性膨胀起来的宗教扩张精神为动力,想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直接从属于罗马教廷的“传教省”。为了维护基督教的“纯正性”,他又推行了一套与“适应”策略相对立的“激进”策略。庞迪我和利玛窦均认为中国人祀天、祭祖和参拜孔子是种社会习俗,因此对教民的上述礼仪行为一直采取一种默认的态度。龙华民则认为上述礼仪是种偶像崇拜活动,因此,他严厉禁止中国教民祀天、祭祖和参拜孔子,因而激起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愤怒。龙华民还一反庞迪我和利玛窦文化调和主义的做法,而着力强调基督教教义与儒家学说之间的差异,由此中国士大夫便开始把基督教当做旁门左道而加以攻击。特别是龙华民为了实现他在中国建立“传教省”的抱负,他急欲扩大教会组织,于是开始把宣教的重心从士大夫阶层转向了“闾左小民”。随着群众性宗教活动的日益扩大,他的宣教活动开始引起南京官方的警觉。

龙华民这种充满排他性的“激进”策略终于激起南京社会的反

教风潮,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京教案”。在南京首先引发的这场反教风潮很快波及到中国大江南北,庞迪我和利玛窦苦心开创的在华传教事业面临毁于一旦的危险。

庞迪我为了坚持“适应”策略曾和龙华民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在“南京教案”触发后,庞迪我遂写下《具揭》一文,从“适应”策略的角度再次论证基督教教义与儒家学说的一致性,试图以此缓解汹涌而来的反教风潮。但龙华民所激起的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业已演变成一种激烈的政治对抗。即使庞迪我本人也难免被驱逐出中国的厄运。1617年在万历皇帝颁发“禁教令”之后,庞迪我不得不离开他居住17年的北京,一步步循着当年北上之路艰难地走向南方。1618年庞迪我病故于澳门,就此结束了他在华21年的传教生涯。

庞迪我是在东方传教运动宣教策略的大调整时期来到中国的。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体察,庞迪我终于认识到耶稣会要想在中国求得发展,沙勿略所倡导的“适应”策略是唯一正确的宣教策略。所以庞迪我一直追随利玛窦在宣教活动中坚持这一策略,并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他们在传教中所积累起来的新鲜经验,使沙勿略为“适应”策略所确立的那些原则变成了能够迎合中国社会需要的一系列行为规范,从而增加了“适应”策略的可行性,这是利玛窦和庞迪我对东方传教运动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这一系列在中国传教的行为规范,后来被康熙皇帝称之为“利玛窦的规矩”。由于庞迪我认识到是否遵从“利玛窦的规矩”是决定耶稣会在华传教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头等大事,所以在利玛窦故去后,尽管面对着龙华民一派的强大压力,他仍为贯彻实施“适应”策略而做着不懈的努力。可以说在“适应”策略形成与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庞迪我是个承上启下的中坚人物。因此,在一些天主教史的著述中,把庞迪我与利玛窦和艾儒略这些名声最为显赫的耶稣会士并列,称其为中国传教团中的一位“巨人”。

庞迪我来到中国之日,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性巨变之时。晚明商品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并引起沿海经济结构性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对科学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由此,我国传统科学进入了总结时

期。我国传统科学要求得新的发展则必须加强科学实验并应形成新的科学思维方式,即严格的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然而这两者又恰恰是我国传统科学中最薄弱的环节。

16 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殖民国家在东方的扩张已使中国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用中国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所构想出来的世界体系模式,已不能解释现实的外部世界的变化和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因此重新认识中国以外的世界,已成为我国知识分子先进一翼的迫切要求。

总之,无论解决中国由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或是想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得出一个清晰的新概念,都需要反对“空谈心性”的虚浮学风而倡导“实学”。

庞迪我来华后,他已敏锐体察到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和这种社会变化在中国士大夫心理上造成的影响。于是他主动地去迎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他以介绍西方天文学、数学和舆地学知识为手段,力争与中国知识分子先进一翼结盟,像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和王徵等都成了庞迪我的友人。在一般士大夫中间,也有许多人认为“天学”即“实学”。在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庞迪我进一步增加了他在中国社会中的声望。所以当 1610 年 12 月钦天监在预测交食失误后,礼部官员便向朝廷推荐庞迪我等参与中国历法的修订工作。

庞迪我则利用这一契机带动熊三拔、阳玛诺等传教士积极投身中国历法的修订工作,并对《几何原本》进行了增订,同时庞迪我又与孙元化合作撰写了《日晷图法》一书。庞迪我等传教士直接参与中国科学实践活动,促进了中国传统科学与近代科学接轨的进程。

这一历史时期,庞迪我还遵照万历皇帝的旨意绘制了一张《万国地海全图》,并在《万国图志》的基础上写出一部世界地理概述,这就是后来由艾儒略整理出版的《职方外纪》。庞迪我这部世界地理概述的手稿曾在京师士大夫中间辗转传抄,为我国知识界打开了认识外部世界的窗口。

综上所述,可以说庞迪我在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中曾起到一个先驱者的作用。

庞迪我在中国传播科学知识以及参加中国的科学实践活动实际上是在实施他所一直信奉的“适应”策略,直接目的是扩大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而且他的这种努力应当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就是通过对庞迪我等参加中国科学实践活动的观察,才认为“天学”即“实学”,它可以起到匡时济世的作用,因此才向庞迪我靠拢并最终归信了基督教。然而庞迪我带动北京会院的传教士投身于中国科学实践已使北京会院的宣教活动渐渐淡化为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行为。在这种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传教士为了避免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双方又相当自觉地把探讨问题的范围主要限定在属于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范围之内。即双方都以自然法则为基础共同来探讨制约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原则。上述这些内容无论从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念来看或是从西方人的文化价值观念来看,都是双方可以认同的,或是可以求同存异的。这种异质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可以说体现了人类文化全球化的这个未来方向。

庞迪我坚持“适应”策略的目的是想在不引起东西方文化冲突和政治对抗的前提下,达到使整个中国基督教化的总目标。然而实施“适应”策略的进程却不以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北京会院的宣教活动日益呈现出一种文化交流的性质。庞迪我推行“适应”策略的结局反而构成对他原有理想的否定,庞迪我深深陷入无可奈何的“二律背反”之中。

400年前,庞迪我跨过东西方两个世界的边界,从一个文化区域迈入到另一个文化区域,在他的社会活动中明显地体现出跨文化的特征。因此追踪庞迪我的历史足迹有助于我们探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规律,并能从中引申出具有当代意义的一些启示,即为我们展望人类文化未来的走向提供有益的借鉴。这也是时代的要求。

在当代,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标志着人类社会正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的急剧转变。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人类社会正以空前的速率向前迈步。当人们刚刚熟悉现代主义的概念,“后现代主义”和“后后现代主义”的提法又不绝于耳。不同时期文明发展的速度同它距人类历史发展

的时距的平方成正比的这一论断,正为人类社会的新发展所证实。

从500年前地理大发现起,人类已开始迈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但只是到了今天,人们才感到真正的全球化的时代正在到来。

当人们在展望“冷战”后多元化的世界将以何种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跨入新世纪的时候,对于亿万普通人来说,他们则更关注人类文化的未来走向,即物质生活的全球化是否会导致精神生活的全球化。

人类文化的未来走向是全球化抑或是更加多元化和民族化,或者像某些西方学者所预言的那样人类将进入“文明冲突”的时代,这一涉及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不能不时时萦绕于亿万人的心间。这也就是全球范围内涌起“文化热”的起因。

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转向四个世纪以前由地理大发现而开始出现的东西方文化相互冲击与碰撞的时代,并希冀从这种异质文化交流与融会的进程中总结出人类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由于西方传教士在上述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潮中曾起过重要的中介和先驱作用,因此近年有关西方传教士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的研究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像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卫匡国,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以及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等正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他们的著述、日记、书信和有关中国的札记不断被发现并在整理后出版。有关他们生平和业绩的著作相继问世,以他们的历史作用为主题的国际会议更是频频召开。

与上述研究热潮相对照,庞迪我几乎处于被遗忘的角落。这其中历史的原因:尽管西班牙在地理大发现以后伴随着殖民扩张已成为空前庞大的“日不落”帝国并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潮中曾起过重要的先驱作用,但终因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迅速衰落和瓦解,在国际事务中它已处于默默无闻的地位,以致它往昔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贡献也很少被人提及。庞迪我之所以没有成为当前研究工作中的重点人物也有其现实原因,即庞迪我的书信、札记和著述目前仍处在间或有所发现的过程中。已记录在案的一些庞迪我的著述又分散在海内外不同的图书馆和修道院中,这一因素也造成研究工

作的实际困难。但庞迪我终究是中国传教团中的一位“巨人”。不深入研究庞迪我的生平和业绩,就难以全面认识东方传教运动中“适应”策略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及其本质特征。庞迪我终究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位先驱者。不深入研究庞迪我所参与的我国晚明的科学实践活动,就难以对西方传教士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历史作用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也就是笔者决意筚路蓝缕奋力从事庞迪我研究的原因。

《庞迪我与中国》一书最终得以完成,也是因为1992年笔者有幸前往西班牙进行学术考察并发掘到许多有关庞迪我生平和业绩的重要资料。此外,由于海内外学者的大力帮助,使分散在国外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中的庞迪我的著述陆续集中到笔者的手中。

《庞迪我与中国》一书,以地理大发现以后全球一体化进程为背景,以东西方文化交流大潮为经纬,以晚明中国社会为舞台,并着重从耶稣会“适应”策略形成与发展的新视角来研究庞迪我的生平和业绩,以期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规律进行一些新的探讨。

本书之所以选取从耶稣会“适应”策略形成与发展的视角来研究庞迪我的生平和业绩,也是从我国当前有关西方来华传教士的研究现状出发的。众所周知,把西方传教士一律看做殖民国家的“别动队”,把西方传教士的在华活动一概斥之为文化侵略行为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当前在有关基督教史的研究中,过高评价西方传教士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却有形成一种趋势的可能性。在论及16世纪与17世纪之交,中西文化交流之所以没有造成深刻、广泛的社会影响时,也主要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和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排外心理和以此为出发点所构筑的“华夷之防”。

持上述观点的学者主要是从中国社会对外来文化的反应这一角度来展开自己的研究工作的,而对于带来西方文化的那些传教士本身却缺少具体入微的分析,甚至往往把他们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这就是造成上述片面性的根本原因之一。

事实上如前所述,在地理大发现以后,基督教世界已经发生了分裂。不仅宗教改革运动与反宗教改革运动处于生死搏斗之中,即使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也存在着是借助军事暴力手段或是采用和平

方式借以达到宣教目的的重大分野。在同样力主用和平方式使东方国家和民族基督教化的传教士中,又有主张实施“适用”策略的和坚持基督教教义“纯正性”的两类传教士。即在庞迪我来华的时代,不同的传教士一方面由于其个性、教养及文化背景和所来自的国家各异;另一方面,他们同中国接触的性质和形式以及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最终解释不同,因此在使中国基督教化这个相同的目标下,他们仍可能信奉不同的传教策略。在中国实施不同的传教策略,往往会引起不同的社会反应:在北京会院,由于庞迪我始终坚持“适应”策略,则使其宗教活动带有明显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性质;在南京会院,由于龙华民一意推行排他性的“激进”策略,其有组织的宗教活动最终导致了一场政治对抗。不要说在中国,若把龙华民的那套传教策略拿到欧洲一些国家去推行,甚至会引发一场酷烈的宗教战争。

我们认为研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不着力研究这些传教士具体奉行着什么样的传教策略思想,那么难免把中国社会对西方传教士不同的宣教行为的反应都一律当做中国与西方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来看待,即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我们尤其想指出这样一点,信奉不同策略思想的来华传教士,在传播与介绍西方科学知识这一问题上,其态度也极为不同。事实上,只有信奉“适应”策略的那些传教士才以较为积极的态度从事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与介绍活动,以此来证明基督教文明的优越性。龙华民和澳门耶稣会上层领导则坚决反对把介绍西方科学与宣传基督福音相结合的做法,而夹在上述对立双方之间的熊三拔等,则对传播科学知识采取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消极态度。可以说耶稣会内部对于在华宣教策略上的分歧是阻碍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传播的极为重要的原因。把16世纪与17世纪之交中西文化交流没有得到深入、持久的发展的原因完全归之于中国诸社会因素,显然是不全面的。

综上所述,可以说在有关西方来华传教士的研究中,不考察这些传教士所具体信奉和遵循的传教策略,很难对他们的在华社会实践活动做出准确、客观的评价。其中,尤以“适应”策略,即“利玛窦的规矩”在明清之际的来华传教士中影响至深,而庞迪我又是这一策略承上启下的中坚人物。这也就是在《庞迪我与中国》一书中,我们

决定从“适应”策略形成与发展的角度研究庞迪我生平与业绩的原因。同时,通过庞迪我的在华传教活动,又会加深我们对“适应”策略的发展进程及其本质特征的认识。

庞迪我一生跨越了广阔的时空范围,在多种社会领域中留下了他的身影。因此研究庞迪我的生平不能不涉及到世界史、中国史、宗教史、思想史、文化史、科学技术史以及社会经济史等诸多学科的内容,所以该书也是从事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一个尝试。

目录

前 言	… 北京塞万提斯学院院长 易玛·孔萨雷斯·布依	(1)
序		(1)
第一章	庞迪我的东方之梦	(1)
	一、西班牙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与耶稣会的建立	… (2)
	二、庞迪我的东方之梦	(11)
	三、1597 年庞迪我到达澳门:兼论东方传教运动中的 民族问题	(20)
第二章	从南京到北京	(34)
	一、南京:庞迪我与利玛窦相会	(34)
	二、循运河北上	(37)
	三、逃出马堂的魔掌	(43)
第三章	“觐见”万历皇帝	(53)
	一、京城献宝	(53)
	二、“觐见”万历皇帝	(60)
	三、揭开紫禁城的面纱	(64)
第四章	耶稣会“适应”策略的形成与发展	(72)
	一、“适应”策略:对西方传教士在美洲大陆推行军事 传教路线的经验总结和反思	(73)
	二、沙勿略与耶稣会“适应”策略的形成与发展	… (83)
第五章	庞迪我与中国	(98)
	一、庞迪我的中国观	(98)
	二、庞迪我:融入中国社会的“西儒”	(114)
	三、与庞迪我交往的中国士大夫:兼论晚明中国社会的 特点	(126)